

21.08

广元市文史资料

89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广元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目 录

前言	(1)
我的路及田颂尧浮沉	(1)
剑阁旧政坛上的“二刘”	(17)
李纳武士匪武装史话	(25)
民国时期的监狱	(30)
解放前剑阁官场见闻	(36)
国民党抓兵血泪史	(43)
民国二十四年剑阁县城火灾回忆	(51)
袍哥组织及其在旺苍的活动	(54)
苍溪哥老会	(71)
“青帮”在剑花絮	(79)
青川袍哥组织中的“打红棍”	(84)
民国后期剑阁部分社团活动情形	(88)
吴龙骧在剑阁办“国术馆”的始末	(93)
漫话“跑江湖”	(95)
旧社会的“丐帮”	(102)
烟匪烂了两个县长一个专员	(110)
解放前青川禁烟一例	(119)
猪儿咬猪窝内斗	(124)
古城山鸦片种植及禁烟史	(127)

解放前苍溪“禁烟运动”中的怪事·····	(137)
青川解放前禁烟见闻·····	(141)
民国时期禁烟种种·····	(147)
解放前的苍城赌博·····	(151)
烟赌是毒害青年的魔王·····	(155)
忆一对鸦片瘾夫妻·····	(161)
妇女遭凌辱、民风遭破坏	
民国时期广元的娼妓盛行·····	(164)
记童稚姊妹为妓的遭遇·····	(170)

我的路及田颂尧浮沉

陶德渊

一、最初的路

我在北洋系统陆军二十二混成旅王鸿恩部干了七年多，后王受陕南第七师吴心田利诱，带领新成立的一个团又一个营，北上关中助吴夺权，但又避不作战，致吴被刘镇华击败，退回陕南，阻王归路。王困住咸阳无法回川，与刘亦不能相处，遂勾结河南岳维峻部，西击陕刘，不料途中有变，来者为李云龙部，刘虽败去，王处境仍艰。吴佩孚武汉再起，调王部前去扩充成师，途经潼关，被李部阻击，退守晋西南，假道不成，被迫缴械。王只身逃奔武汉，吴却命王出川，余部仍扩充成师。王派我和另一同学回川传达命令，并侦察出川路线。我乘轮到万县登岸，经绥定、阆中赶到三台、绵阳，方知旅部和刘惠心、郝毓川两团被吴心田出兵攻击，退到梓潼已被21师41旅吞并。我在特遣支队部绵阳禁烟局度过一段时间后，到1926年夏，方回广元家中闲赋。

北洋系统封建专制性很浓，政权虽多次更易，但仍以正统自居，视南方革命为叛，文电中称孙中山为孙文。我入伍前后虽读过部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钞》，学了点西方新兴思想及科学，如《民约论》、《天演论》等，认识到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为了寻求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疯狂向

亚非弱小民族侵略，扩张其殖民势力，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即深受其害。但理解仍很肤浅，如我在王部模范连同学录序文中，即有《打倒帝国主义，即以制我者还制其人，合乎物竞天择，务使我优胜而劣败》之语是何等幼稚。

但在家亦未完全闲赋，我在老师孙策臣所在的团练局管帐，并早晚坚持冷水浴、“八段锦”、打沙包、写字、并读《墨子》，有时得到一张《响导》，即反复细研，从未置身革命。

团练局长赵常武，是广元有数的大地主，专门干些卖官饷爵的勾当，局内的营、连长都是出钱买的。他托孙先生约我去当营长，我说：我是军人，加入买官之列，令人耻笑，大家都是出钱买的官当，我也无法指挥，请先生代我谢绝。

不久我离开绵阳，得到本周明亮的小册子，介绍南方革命的概况：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统一了广东，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的消息。以后又看到几期《响导》报，了解到北伐进展迅速革命形势大好，深惜我在武汉停留短暂，又未接触外界，以致未跟上形势，未就近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而颇感苦闷。次年春，消息传来，北伐顺利，已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四川各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田頌尧当了廿九军军长，开办政治讲习所，命所属各部和防区各县，保送学员。我即报名到县府应考，因我已有一些革命知识，答卷成绩突出，得到录取，教育界的王羽、张培林，也被录取，我们三人乘滑竿按期到了三台。

二、在二十九军政治讲习所

二十九军政治讲习所，设在三台县谭家祠堂。室内墙壁正中是孙总理像，两边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横额是“天下为公”，下面是“总理遗嘱”和悬挂的青天白日旗，此外，墙柱上还贴了些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写的标语，令人耳目一新。

讲习所领导人由军政治部主任蒋特生兼任，教育副官是胡剑门。学习人员分①学员班，由所属各部选送的官佐，约200人；管理员方超（黄浦生，后来当四川警察总局局长）。②特别班：是防区选送的公教人员，约百余人，管理员罗崇礼。③学生班：由各县选送的考生，约百余人，男女各半。男生管理员，先是郑南生，后换为赵伯略（均是黄浦生）。女生管理员是范琼英。男生着油绿色中山装，女生着白衣黑裙装。以上除男生住谭家祠堂外，余分住在三台城内学校里面。

讲习听的教官，主要从成都各大专学校聘请，总教官是李哲生，教官有陈任民，李元白、杨先循、雷雨琴、谢天民、林××、戴××（名字记不清）、彭亚东等。课程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世界大势》、《政治概论》、《经济概论》、《不平等条约》、《革命歌曲》和演说实习等。讲义由教官编写油印，因为时间短，只能概略讲述，但李元白讲授的《国际大势》，将近百年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后，列强对殖民地瓜分争夺的大致脉络，却能使我了如指掌，陈任民讲《经济学概要》，不但讲正统经济学，也讲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彭亚东教歌曲，如：《国民革命歌》、

《工农兵联合起来》、《国际歌》。我还买到了《三民主义》原本，系统读了一遍。所以，在讲习所虽只半年多时间，还是学到不少东西。我因成绩优异，毕业考试时，名列学生班第一。行毕业典礼时，田颂尧、蒋监督、主要教官讲了话。刘大元也在结束时讲了话。刘个子不高，面戴深度近视眼镜，人已中年，讲话声音洪亮。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奔走于京、沪、武汉、广州等地，代表军长与蒋介石、汪精卫以及各地实力派联系的情况，还介绍了田军长如何英明能干、部队团结、防区安定、各方对军长和全军如何尊崇关怀重视等等，没有想到，此后我竟会与他关系密切，荣辱与共。从讲习所结业时，我们都填了入党申请表，介绍人写的田颂尧、蒋特生，虽未领到党证，也无组织形式，但同学们都自认为是国民党员了。

毕业后，学员班的人仍回原部队，特别班的人回各县办党务或教育，学生班的人，除选留男女共二十人到政治部外，其余回各县当宣传员，我被分到军政治部。

三、在军政治部

田颂尧二十九军政治部，编制有宣传（科长雷雨琴）、秘书、军事、艺术、统计、调查等股，我在宣传科供职。宣传科有了我们十几个宣传员，每到逢场即到茶馆教唱《国民革命歌》，讲演三民主义；此外，我办过不定期刊物《血花》。各科股无所作为，艺术股长刘绍陪，只忙于为军长画像，既不向部队做工作，也不与群众接触，以后，我被升为统计调查股股长，也无事可做，只每月在宣传后作粗略的估计，统计听众人数。大家每日除照例的办公时间外，余暇到三台公园坐茶馆。我如饥似渴的找读有关的社会科学书、如

《哲学概论》、《论理学》等。经过学习，我逐渐感到二十九军除挂了个“国民革命”的旗帜外，对防区征粮、征税、摊款与过去毫无减轻，我觉得要革命只有出川到南京、上海，于是大家又补习数理化，还请福音堂教士教授英语。同学中如陈开泗、杨世燧，率先请假出川考上了南京政治大学，我们非常羡慕。政治讲习所第二期改为军事政治学校，招生近千人，编成三个大队，也成立了一个政治部，由宣传科长雷雨琴兼主任，我兼宣传科长，杨世燧兼总务科长。学校并未对学生进行什么政治思想教育，只是每周去主持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行礼如仪。政治报告也没有什么内容，找不到材料，报纸极少，又常迟到。军政治部每召开一次纪念周活动，都要请军部秘书长吴宗俭来做报告，他仅念几条收到的各方电讯，或讲点传单报上的东西，全是些东拼西凑的内容，杂乱无章，矛盾百出。我这个科长，枉有名义，实无事情可做，反觉是一苦恼。每天办公事时间无公可办，正好看书。三台书店内新书不多，就找人借。我买到一本漆南熏著的《日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对各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所订的屈辱条约，论述全面而详细，看后认识比在政治部讲习所更进一层。

我们逐渐看到，四川各军虽然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少人还升了官，但其余一切如故。各军都开办了银行，发行纸币，银元除孙中山、袁大头、大铸龙洋，能十足通行外（袁大头也有睁眼闭眼之分），川板银元则有“元字开口”“角字分头”等区别。铜元大二百之后，又出现了廿九军旅长罗乃琼把广元真武宫十八雷神铜像拆去化铜用，在广元开造币厂，大造薄而字迹模糊的小二百铜元，强迫行使，以致群众怨声载道，物价飞涨，真是“五角劣币破烂哑”“三个

破烂邓田刘”，“民怨遍全川”。还借修保广马路之名拍卖全县官、公庙产，结果一寸路也未修，又成立无马的骑兵团，筹款部分入了私囊，还发彩票修筑西关税河堤，大捞一把，迫使地方为其立德政碑，如此等等，那有一点革命军的影子。

有两件事先后传到三台，使人迷惑震惊，一是廿一军既然是国民革命军了，为什么还镇压群众的革命行动，造成《三三一》惨案。二是成都三军联合办事处，为省一中事件杀了十二个共产党员，其中有袁师尧。袁是盐亭人，当过潼川联立高中校长。他为人正直敢言，遇不合理的事，常愤怒批评，不留情面，人们叫他“机关枪”。在田颂尧就任革命军长的典礼上，袁是来宾之一。田讲话时说：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不肖”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劣绅土豪，田对“军阀”二字有些敏感，故加“不肖”以示他虽是一个军阀，但属好的一类，与别的军阀不一样，不在打倒之列。当时在坐者（旅长以上将领和地方士绅）均无异议，不料袁被请讲话时，首先对田军长毅然率部参加国民革命行列，共完北伐大业，特表崇敬和祝贺后，接着话锋一转，说，刚才田军长言，打倒不肖军阀，对“不肖”二字不敢苟同，因为军阀没有“肖”和“不肖”之分，只要是军阀就是反革命，就属该打倒之列。袁的这席话使在坐者无不震惊，田也面红耳赤，但事后田并未报复，人们皆称其厚道，也佩服袁有胆识，这一次闻袁被杀，多说袁若在三台可能保全。

蒋特生是田颂尧保定军官学校同学，简阳同乡，以军参谋长名义兼任政治部主任及政务厅厅长，性直敢言，曾嘲讽田颂尧：“白天进部要打马灯”。他酷爱佛学，每天空时即诵经打坐，对佛学有较深的造诣。有次照像，他背后出现了

圆形光圈，更信已经得道，我们对此迷惑不解，去追问像馆的唐聋子，他表情神秘，更使我们怀疑。蒋对我们宣传队这批青年很器重，星期天多次邀到他家玩耍，天南地北地扯，并招待吃饭，他还喜欢到琴泉寺庙中作尽日游，也邀我们同去，并带上厨子自作饭菜。他常与僧人接近，河对面东山寺内的老和尚熟读四书五经，善诗文，是他的座上客。有次为庙产纠纷，老和尚被三台县谢觉民（也是由政务厅科长升的）关入监狱，蒋勃然大怒，把谢叫来拍桌大训，一时成为三台的头号新闻。总之，像他这样不嗜烟酒不贪钱财的人在川军将领中是少见的。他晚年生活拮据，进了成都净慈寺后，老死庙中。

三台福音堂的英国教士在革命高潮时，被吓走了，福音堂的牌子也换成了三台医院，后因经费困难，院长罗锡金写信将教士请回，并恢复了福音堂原名，我们宣传队的人对此事很气愤，在一个夜晚将牌子取下砸烂烤了火，用粉笔在墙上写了许多痛骂罗是洋奴买办的标语。

军事政治学校有个大队长叫杨达，是黄埔军校学生，我曾借过他一本关于唯物主义哲学的书，尚未看完，他即派人持信来要，我将书交来人，把信随手放进一个卷宗内。1928年夏末，三台市面突然发现了骂廿九军挂着革命招牌不革命，政治部是聋子耳朵的油印传单，雷雨琴怀疑是黄埔生们搞的，找到了我以前夹在卷宗当中的信，对照笔迹，结果杨达被撤职离开三台，这对我思想上是一个打击，不明真相者认为我出卖了朋友。我写信把内心痛苦告诉正在盐亭当县长的老师陈任民，表示拟请假离去，他回信寄以同情并邀请我到他处去，我即借故请假去了盐亭。陈老师派我管庶务，下乡查过一件几任未了的案件（大恶霸任某的案），还

派我检查邮局信件，扣留过一大包国家主义派的宣传材料，请蒙伯扬先生帮我审查。

四、军训后新安排

1930年阴历年过后，我安排了家人生活，三个弟弟回学校后，即到成都山西会馆，廿九军行营见田军长，面报我去年家庭的不幸（父丧，田曾送过锦联），请准我仍回部队效力。这时刘大元在坐，他即要求派我到训育部，田即下令任我为训育部上尉课员，我与刘大元共事的历史从此开始。田颂尧的廿九军防区，当时跨川西北，计有广元、昭化、剑阁、阆中、苍溪、南部、通江、南江、巴中、三台、盐亭、射洪、梓潼、江油、中江、绵阳、绵竹、德阳、罗江、安县、彭明、平武、北川、成都、华阳等廿五个县。部队发展到四个团，还有空军筹备处，准备买飞机，廿九军无异成为一个川西北国。但由于各部来源组织复杂，且又分住各县，不免各自为政。田颂尧为了统一部队思想，树立军部权威，增加训练，提高战斗力，特成立了“训育部”，主办此事，分期分批地集团训练，另外还成立了驻区事务部，统一了财政民政。训育部住于军部以东近邻潼川高中的—个庙里，师旅长为委员，设总务训练教育三课，总务科长谭尊武、训练课长敬肇谦、教育课长刘大元；前者负责军事训练，后者负责政治思想。教官中集中了一批较优人才，有黄浦生陶式荪，留德学军事的王兴智，留学生田有耕，还请了体育教官段燕轻、王安仁等。训练以四个月为一期，每期集中几个团统一训练，除制式教练外，还要进行野外演习、夜间演习、实弹射击、障碍通过等等，还组织兰球、田径比赛。政治方面，编发了《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军史》等教材；还编

谱了《廿九军军歌》，其歌词大意是：“岷剑兮巍峨，嘉陵兮奔腾，堂堂我军，国之干城，起义护国，国体得以存；出师靖川，川乱为我平；我军团结，我军奋斗，发挥高威，制服强邻，光大历史永光荣”。还成立了一个“尚志社”为核心组织，社长田颂尧，孙震。那时各军均有这种组织，记得廿四军名“励志社”，廿一军名“武德社”，其实各师、旅、团长除了填写一张表入社外，别无活动。田颂尧曾派我去绵阳、绵竹、德阳等县向旅、团长募捐作经费。

在每期训练结束时，要举行一次盛大检阅，在三台东门外大操场（即北坝飞机场），高搭彩棚，帜旗飘扬，高竿悬挂航空标桶形风标（早已成航空筹备处，邓××为主任，扩大了操场，准备改为机场），军乐齐鸣（钢管乐队进出场均奏三遍），田颂尧登台阅兵，各部队排成方队，依次正步通过阅兵台，最后田颂尧通过扩音器训话，其威严之状真如国王。

五、在军训处的工作和学习

我的寝室与三台潼川高中只隔一墙，每闻学校上课铃与读书声非常羡慕。我在训育部工作不多，夏季潼川高中招生，我遂以陶德渊（我本名德元）应考理科，竟得录取。我每天按时去听课，余时办公，晚上自习。给我们班上课的教师有傅小靳，卿良汉、汪一能等。卿老师教数学和英语，我们上数学，同时也学他的英语。傅老师讲哲学，多是新的理论。汪老师有时还陪田军长打网球。1930年秋末，这三个教师突然离校出走，不久又听说三台中学校长赵毓东也走了，一时纷纷议论。除卿良汉因与王申命（田颂尧的老师、三台人）的女儿恋爱受阻，有逃婚内容外，都可能与参加共产党地下

组织有关，而其压力可能不是在三台，因为廿九军如果要抓他们，他们就不易逃脱，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紧急情况而突然离开三台的，因为汪一能走时连妻子都未顾及。汪妻名陈守贞，就住在军部对面大院内，我们有时去玩，汪的儿子毛毛很乖，汪等走一周，估计不会再回，我同另一同学找到一支下行船，才将汪的家属送走，后来听说她回了广东。据说以后汪叛了党，并与陈守贞离了婚。解放后，我一次去南充川北行署开会，在一个中学里见到过卿良汉老师。今年几次听人说傅小靳就是傅钟，《巴山峰火》中有回忆红四方面军在川北活动的文章，我县张汉卿同志说他在广元中学当过教师，并说是三九年离开广元的，我开始有些怀疑，后来在报上见到傅钟的照片我才信了，这正是当年傅小靳老师啊！

至于汪一能，我1940年从抗日前线请短假回家，他正任广元县长，我去看他，问及师母和毛毛，他用另外的话叉开，我想他定有隐衷，以后他调松潘当县长，特约孙杰当秘书，汪在松潘因铲鸦片烟苗被少数民族打死。

1932年底旧历年前，三台是廿九军军部所在地，由于城里拉兵，我请假回家过年，因城内拉兵，乡下中青年不敢进城，找不到人抬滑竿，时已腊尽，令人焦急。我的勤务兵建议，他愿挑行李一同步行到离城廿里外，准可找到滑竿。我们出北门沿小路向北走，果然在乡下雇到滑竿挑夫，沿途加班赶行，经柳池井，石牛铺上大路，在灵山寺小庙过除夕，元旦经剑阁剑门关，避开七里坡改走宝轮院，于正月初二夜十点才赶到家，不久去成都，意外地遇上一个出川机会。

六、意外出川

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四川有代表二人，这两名代表都是廿九军的人，即行营参谋长马瑶生和经理处长常震川。常处长与岳父是旧交，我请他安我为随员，他慨然应允。我们一行，有马有勤务兵，常带了太太小儿子乘汽车经新津到嘉定，瞻仰大佛，游览了凌云、乌龙，吃了江团后，再乘木船经五通桥到宜宾，换乘小轮到重庆，改乘外轮东下。这是第三次过巫山峡，可惜对白帝、张飞庙等仍未登游，船将到宜宾，突闻轰然水声，以为有人落水，急到船舷观望，见一油布大包在水中飘浮，有一小船正划往打捞，据知内幕者说，那包中是烟土，预先约定在此转运，以避免检查。我们在宜宾又换了一次船才到南京。

过武汉时船停半天，上岸游览黄鹤楼、东湖、武昌起义城楼，还凭吊了陈友谅之墓。在南京参加国民会议，会后随代表晋谒了中山陵。中山陵悬有四川献的八幅竹编《建国大纲》，游览了明孝陵、玄武湖、五洲公园、还去了雨花台，捡了雨花石。

国民会议讨论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但有一件事，记忆深刻。东南各省代表提议修浙赣铁路，西南各省代表力主发展川、滇、黔交通，理由是帝国主义谋我正急，万一开战，沿海必首先遭灾，不如先修通西南铁路系统，既可开发西南资源，万一东南受侵，也有利后方支援。代表们想用传单形式争取其他代表支援，但印刷厂竟然以未经审批而拒绝，议会是否民主可见一斑。

会后，我乘火车到上海静安寺，在××路找到内弟宋廉处，彼与岳父董铁同居，宋妻董仲云刚生了个女儿，尚未

满月。董老先生是商务印书馆职员，租了一栋住房，他住前楼。内弟是1926年由上海大学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还学过军事交通。他告诉我说，他们是去年经伯力、日本回国，过日本时不准登岸，在上海与张某意见不合脱离了组织。为谋生活，改名金戈（号尚诚），进了私立无线电学校，取得文凭，才考进国际无线电台当技术员，月薪40余元，勉强能维持生活。他说，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黄仲翔是他中央大学的同学，去南京是可找到好工作的，但去了必然要结交关系，他不愿当叛徒，只好守穷。问及我的学习，那时因无正式学校招生，主张我住私立学校学习无线电，他可帮助我。无线电，是当时的新技术，四川正缺，于是我同意了，考进私立无线电工程学校，并商定董老先生分租了亭子间，每月连伙食付15元，是最低的费用。董老是复旦大学毕业生，长于英文。学校教师多是讲师或教授，在外找额外收入，多在夜间上课，并用英语讲授。开始除学无线电理论外，主要学收发报，我买了个电蜂鸣和电键，不断地练习，但因年龄大了，有些吃力。到第二期重点转入无线电元件和线路设计，要用高等数学的知识，但教师多能深入浅出地讲授，并着重实用。学校有大功率电台，真空管有一米多高，还有火花式发报机，是那时海船用的长波发电台，也有充电池用的蛋形发电机。我内弟帮我买了一套工具和各种元件，在家里学装收音机，由简到繁，先装矿石收音机，再装一管和多管收音机，最后装了发报机。教师中有留法工程师，私人开了无线电机作坊，我也去实习了一段时间。那时一切无线电材料都是外国货，上海能做的极少。暑假期间我到吴淞中国公学，访问了常震川的女婿黄仲雄时，又认识了几个四川同乡，我们每天去狮子林炮台湾游泳。

秋末，突然爆发“九·一八”事件，张学良遵从蒋介石手令放弃东北，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各界派代表向南京请蒋率军北上抗日，献旗献剑，明请实逼，蒋空言不动，闻有代表大声请委员长“言行一致”，蒋就打翻花瓶，大发雷霆，说侮辱了他的人格。这一场闹剧报上并未登载，是目睹者传出来的。

在全国愤怒失望的情况下，突传马占山嫩江抗日，大家又寄希望于这位抗日将军，纷纷到报社捐款捐物，请报社转交，并抢购街头出售的马占山像片，供诸案头，以示崇敬。投机烟厂马上要造出马占山牌香烟，报上登整版广告，街头遍贴印有马占山骑马像的大幅广告，不料烟未出厂，报上忽又刊登了马占山在长春与日本人坐在一起开会的照片，引起群众极大的震动。虽然大家也分析可能是日本人制造的假象，但马占山牌香烟却胎死腹中。解放后，报上曾报导马在天津做街道工作受人尊敬，并无人说他曾投降日寇。

1932年初爆发了“一二八”，十九路松沪救国军抗战，各界踊跃支援，我曾想参加后勤，但一计算离住地甚远，来去要多用很多钱。因我到上海后，十九军经济上对我毫无照顾，一切费用均靠岳父母接济，我不能不尽量紧缩开支。我每天耳闻远近炮声，靠号外、报纸了解战况。这时黄仲雄等已躲到上海，在我们弄里租房暂住，我们每日一同讨论时局。初期抗战因蒋介石坐不支援，而以失败告终，得到的是屈辱的淞沪协定，令人痛哭！

暑期我完成了学业，取得了中英文并用的毕业证书，当时用英文为了便于在沪就业，是殖民地的耻辱痕迹。内弟鼓动我去了一次西湖，他介绍我往复旦中学同他一起任教的朋友熊飞处，可少花钱。我去后，独自一人出游，靠游船舟子

向导，游览了岳庙、灵隐寺及各处沿湖风景。星期日熊与同事们陪我玩了一天，走遍了龙井、翁家山、九溪十八涧，最后登上北高峰，吃了有名的素席，晚上住地因有床无被，只好打麻将度夜。次晨又下雨，未如愿看到日出。

秋初，我起程回川，与黄仲雄夫妻和余悟庄同行，虽然坐房仓仍然很热，武汉卸货，宜宾换船，各停一天，饱尝了长江火炉的滋味。在宜宾听茶房建议，到三游洞玩了一天。到重庆后乘汽车经潼南、简阳到成都。

七、在廿九军宣传处

刚到成都即遇刘大元，他告诉我，政治部已改为宣传处，他当了处长，欢迎你来。我表示想搞技术工作，他说，以后再说。后请示田军长，任我为少校处员，一同回了三台。宣传处的人有原训育部的，也有新从成都去的。我逐渐知道，原来训育部已撤，刘当了宣传处长，敬肇谦当了宪兵司令，陶式荪当了宪兵大队长。田颂尧每次向部队训话不离“仁道”，刘大元即帮他写了一本《仁学》。他将此书给我看，一开始从“仁”字的结构，接着搜罗四书五经上所有能释“仁”的词句，如“仁者爱人”，“仁者不嗜杀人”“仁为万物之本”，“圣人治民唯仁”等，阐明仁的重要。还以果实之核叫“仁”，更从电子的核心是正电子，用新的科学来说明“仁”是生物物质之源，推行仁道可富民强国的结论。川南有个青年邬不染也从圣经贤传上找了些理论来阐明“仁”，寄来了厚厚的一本稿子，很受田、刘赞赏。于是这位邬先生即被邀到宣传处当了处员，这是隔了年余回到廿九军见到的新鲜事物。此外，尚志社被火焚又新修了礼堂，至于我做技术工作的事，刘则请田给我一个兼电台技术员的名义，并加了